

当代文学研究丛书



# 小说艺术的思考

● 郝榕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当代文学研究丛书

# 小说艺术的思考

郝 榕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当代文学研究丛书  
小说艺术的思考  
郝 瑛 著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 1/32 5.875印张 142,000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2.25元

ISBN 7-202-00456-9/I·123

# 序

朱 寨

读了郭榕同志的《小说艺术的思考》，首先使我想到的的是书作者本人。

我与郭榕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他同另一位北师院的青年教师到文学所访谈，也找到了我。大概就是他在“编后”中所说的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吧。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人帮”利用三十年代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歪曲鲁迅文章的原意，把所谓“四条汉子”打成反革命，由此开始了对整个艺术界的血腥摧残。粉碎“四人帮”以后，它成为文艺界拨乱反正的第一个战役。但当时战幕还没有揭开，当时的政治气氛也不象后来明朗。他们首先发难，远从西郊进城来走访。这给人以担当斥候的印象。那次会面时间很短，谈话内容也很一般，而且主要是另一位比他较年长的教师谈，他似乎什么也没有说。但他那始终冷静审视着谈话内容的目光，使我一直难忘。即使后来熟悉了，有了更多的其它印象，也未能掩盖和改变这最初的记忆。

所谓“后来熟悉了，”也是比较意义上的。例如，他的籍贯，还是不久以前，在他与别人闲话时，我无意中才知道他是安徽籍。又如，只模糊知道他从六十年代就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于他的学历等就一概不知。他对我的了解，大概也不过如此。然而虽然如此，我们相互并不觉得生疏，没有那种因生疏而自然产生的心理距离和戒惕。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会的媒介沟通。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一九七九年秋季，在长春召开的第一次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讨论会上。现在这种民办公助的学术团体，已经是花开遍地，不足为奇了。而当时，还是群众自发组织学术团体的创试。而事先的酝酿、筹备等等工作则肇始于北京师院举行的当代文学讨论会。记得应邀出席的陈荒煤同志也与大家一起，午餐在学生食堂，午休几个人共挤一间。而且讨论会上的报告人也多是名流，如臧克家、张庚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后，一九八〇年夏在北京师范学院还举办过王蒙作品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除了冯牧和王蒙本人，还有美国来华访问学者林佩瑞，是在北师大中文系一个简陋的教室举行的。这个教室是邾谔同志平常授课的讲堂。在上述的活动中，他除了主持过一两次会议以外，其余都是尽东道主之谊，忙于会议的联络、接待、安排等事宜，尽量使这些学术活动，在简陋的条件下，取得内容充实的成效。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他被选为副秘书长，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文学函授大学，他是教务长。当代文学研究会不是实体单位，许多繁重的事务工作担子，压在他肩上。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先后召开过五次大型学术讨论会，除了一次，我都参加了。据我所见，从会前筹备到会议扫尾的会务工作，多由他操持。他沉着冷静，有条不紊，细致周到。工作的老练，很象个富有经验的中层领导干部，却没有丝毫“领导”的架子。与会者大多是高等院校的教师。他对于与会者的细心照顾，象班主任对待学生。而在态度上，都尊称“老师”，待之如学生对师长。他确实具有一般书生少有的干练。但他既不宣示于外，也不热中于此。

邾谔同志是研究当代文学史的。他是北方十院校受国家教委委托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的定稿组成员。后来又受命主编一套当代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持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讲稿》，他也是主编之一。然而在研究和讲授当代文学史之余，他还相当注意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这个评论集，基本上反映了

他近年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成果。他题为《小说艺术的思考》。我想：如果不是那些繁重的社会工作，他不是会有更多的思考成果吗？

从这个集子的文章，更能看到他冷静审视的一面。

郝璐的为人在一般场合下是随和的，而在这些文章中却是阐述着不同于别人的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里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关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评论。除了一两篇评论的对象是别人未曾和较少评论的作家作品以外，其它都是多被人反复评论过的。这样的评论，如果不是采取“后发制人”，横扫千军，或者不加说明地囊括前人的创见于自己的文章中，另有自己切实的新见是不容易的。这些文章的特点，就是对前人评论过的作家作品做出自己的分析，发挥前人未言，或言而未尽的意见。同时对前人的评论，所见相同的都明白指出，不掠别人之美，对于不同的意见也能坦白讲出，是对已有评论的辨析评定。你可以说这些文章不是对某一作家作品的最初发见，缺乏惊人的立论、咄咄逼人的雄辩，以及华丽的词藻。但却朴素诚恳，切中肯綮，不强加于人，而让人自然首肯。

这里面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关于新时期小说作者和作品的评论。新时期前一阶段的主要作家和主要作品在这里都有评论。不知作者开始执笔时是否有意，客观上记录了新时期那一阶段小说创作一些轨迹。这就使读者同时获得这时期小说创作的某一方面系列的认识。因此，这本论文集带有专著性质，是它不同于一般论文集的又一特点。

读这些文章时也能感觉出，作者企图提供给自己的对象以准确扎实的见识，无哗众取宠之心。如果对这些文章的特点作一总的概括的话，我想借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朴素和诚恳的魅力》来说，“魅力在于朴素和诚恳”。如果还需要提出什么更高要求的话，我觉得在朴素和诚恳以外，还应该有关开拓与超越。

一九八八年二月四日

## 目 录

序	朱 蒸 ( 1 )
社会主义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突破	( 1 )
论新时期北京作家群	( 13 )
论新时期的乡土小说	( 26 )
谈当代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 38 )
西部文学漫议	( 45 )
新时期短篇小说与现代派	( 52 )
张洁小说的艺术魅力	( 59 )
论王蒙新时期的小说	( 70 )
评邓友梅小说的“京味”特色	( 80 )
《那五》艺术谈	( 95 )
理想的赞歌	
——读《风筝飘带》有感	(103)
《赞歌》漫评	(108)
从《西线轶事》看新时期军事文学向人学的升华	(115)
应当珍视“信念、热情和向往”	
——致母国政	(124)
张承志小说的主体意识	(130)
林斤澜近作一瞥	
——评《李地》及其它	(137)
一个文学新人的出现——评刘恒近作	(142)
叶辛创作管窥	(145)

突破“车间文学”禁锢的蒋子龙短篇小说·····	(155)
农民灵魂的“摆渡人”	
——谈高晓声与农民之间·····	(164)
朴素和诚恳的魅力	
——谈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	(169)
社会主义农村的风俗画	
——读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	(177)
编后·····	(181)



## 社会主义新时期短篇小说 的发展和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新时期短篇小说是新时期文学中一支最突出的部分，它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必须有比较观念，把它与过去二十七年相比，以便在更深层次上看到它对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贯传统。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革命的现实主义就已成为革命文学的主流，尤其是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我们的作家更加自觉地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原则，从生活出发，真实地、历史地反映民主革命的伟大业绩。在他们的作品里，描写了前所未有的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并且运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建国之后的短篇小说创作，继承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也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就。但是，纵观“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二十七年的小说创作情况，我们不能不看到革命现实主义发展的道路很不平坦笔直，它曾经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有时被歪曲，有时虽有表现但却并不充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则被彻底否定了。这段历史教训，我们很有必要加以认识和总结，把它作为前车之鉴。

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六年这十七年间，以赵树理、周立波、李准、茹志鹃、马烽、王汶石、王愿坚、峻青等人为代表，创作了

丰富多采的作品，把新中国短篇小说园地铺成斑斓的花坛。《登记》、《山那面人家》、《不能走那条路》、《百合花》、《我的第一个上级》、《风雪之夜》、《党费》、《黎明的河边》等，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众口称赞的优秀篇章。他们的作品，以反映工农兵为建设新中国而进行的火热斗争和建国后人民生活巨大变化为主题，遵循着革命现实主义原则，在作品中真实生动地塑造了一系列鲜明活泼的人物形象。但是，在我们承认这些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他们的现实主义精神还未达到充分的程度。一般来说，当时的短篇小说从内容上看无非两种题材，一是革命历史题材，如《黎明的河边》、《党费》、《百合花》等；另一种是现实题材，如《登记》、《山那面人家》、《我的第一个上级》等。两种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作家依照所谓的“肯定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肯定的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只是正面歌颂描写的对象，除了表现敌我矛盾斗争之外，不大涉及人民内部矛盾和冲突，因此，一般作品或多或少带有“无冲突论”痕迹，反映的现实矛盾是比较肤浅的。同时，由于文学的政治功能被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过分的要求作品为每一时期的中心政治服务，使得作家们创作的着眼点不是从生活真实出发，而是根据政策需要去搜集生活。如以赵树理同志为首的山西派的农村题材作品，大多数都是为解决农村政策贯彻中遇到的问题而创作的。这些作品表现了相当高的政策水平，但是如何达到高度的政治性与完美的艺术性相统一？现在看来不能不说还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尤其是五十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政治上的反“右”斗争，文艺政策进一步走向左倾道路。当时文艺领导机关甚至提出文艺工作者应当“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等等紧密配合中心政治运动的要求，还提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作品”一类行政命令式的干涉，并在创作题材上划定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种种不可逾越的禁区。这种“左”的文艺政策，不仅无助于加强党对文艺工作

的领导，而且挫伤了作家的积极性，削弱了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短篇小说创作相当普遍地出现了以抽象的政治说教代替具体的形象的描绘，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严重。革命现实主义要求革命的政治倾向性应当隐蔽在艺术的形象之中，倾向性越隐蔽，则思想性越深刻，这是艺术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表示不大喜欢席勒而比较欣赏莎士比亚，道理就在于此。席勒诚然是位了不起的诗人和剧作家，但他的作品缺乏莎氏的形象，较多的是给人以抽象乏味的说教。五十年代中期的作品，虽然也不乏优秀之作，但相当数量的作品是直露的，是图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宣传品，由于缺乏艺术性，所以思想性也就谈不上深刻。

一九六六年，文学的双脚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泥潭。林彪、江青篡党夺权，也没放过对文艺工作的控制。他们提出什么“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创作原则”，从唯心主义的先验哲学观和个人英雄主义世界观出发，彻底地否定了革命现实主义。在他们的伪理论指导下出笼的所谓文学作品，诸如《一篇揭露矛盾的报告》、《初春的早晨》和《金钟长鸣》等，完全是歪曲现实的拙劣之作。它们是按照“从路线出发”和“主题先行”的反现实主义方法编造出来的，是为“四人帮”反革命政治服务的“阴谋文艺”。“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是革命现实主义倍受摧残的最黑暗阶段。

如果我们把十七年短篇小说的创作原则概括为有限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化大革命”十年为反现实主义的话，那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的短篇小说的创作原则，则可以概括为比较充分的发展了的革命现实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清算了“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并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新经济政策，使我国开始跨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的新时期。一九七九年全国四次文代会召开，邓小平同志总结以往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精辟地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

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荒谬做法，破坏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扼杀了文艺生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邓小平文选》185页）邓小平同志关于领导方式改变的这些深刻论述，为新时期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天地。在这种新形势下，文艺创作领域也充溢着春天的气息，作家思想解放，创作积极性大为高涨，短篇小说创作不仅数量空前，而且质量也较过去有很大提高，达到了繁花似锦的蓬勃发展局面，其具体表现为：

一、突破题材禁区，坚持从生活出发。新时期短篇小说创作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路线出发”的。在题材方面，作家最先突破的是大胆揭示“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现实，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戒律，把“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赤裸裸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的“伤痕文学”，愤怒控诉了“四人帮”假借党的名义给中华民族、给我们的下一代造成的精神扭曲，为文学正确处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关系，创造了可贵的经验。以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和张贤亮的《灵与肉》等为代表的“反思文学”，从审视历史的角度，揭露了我们建国之后左倾思想发展的脉络，为寻找“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形成的原因而做出了贡献。人们在总结历史教训之后，并非只停留在对创伤的抚摩和对不幸岁月的回顾之中，而是放眼未来，把希望寄托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上。国家经历了三十多年风风雨雨，终于在党中央领导下走上恢复和发展的道路。全面改革，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光荣使命。在改革中，矛盾和斗争、成功和失败、痛苦与欢乐，这一切都给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因此，反映各个领域改革题材的短篇小说——“改革

文学”如雨后春笋，成了文坛令人瞩目的创作热潮。在反映改革题材的一长串小说名单中，我们首先应当提及的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等讴歌“开拓者家族”的系列小说，一扫以往所谓“车间文学”的积弊，从单纯的描述技术改革或生产劳动的过程转向对改革家命运的描写，体现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在他的作品里，乔厂长、金厂长等的个人命运是与工厂改革成败紧紧拴在一起的。乔光朴和金凤池在改革中带有悲壮色彩的拼搏，不仅涉及到对十年动乱造成的弊端的揭露，还更深层次地挖掘了我国社会现实中仍然存在着带有严重封建色彩的官僚主义。这些作品既能以乔光朴这样的新人形象鼓舞千百万人去奋斗，又能启发人们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难和复杂。以改革题材创作的优秀短篇小说除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的系列小说之外，还有柯云路的《三千万》，张一弓的《黑娃照相》，李准的《大年初一》，高晓声的《陈奂生转业》，何士光的《乡场上》，铁凝的《啊！香雪》，王蒙的《说客盈门》等等。这些作品无论是内容的深刻性、反映生活的广阔性和艺术的独创性，都是十七年里类似题材的短篇所不能企及的。

军事题材的短篇小说也有发展和突破。军事小说在建国后一直是比较繁荣的。王愿坚、峻青、茹志鹃、肖平等人的军事题材短篇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尽管军事小说在过去十七年中取得了可喜成就，但是，某些左倾教条主义理论难免也给它套上种种枷锁，如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不能揭示军队内部的阴暗面等等，这些都是不成文的戒律。新时期的军事题材的短篇小说对此有大胆的突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张廷竹的《他在拂晓前死去》等等，一方面继承了我国当代军事小说传统，在作品里歌颂了我军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时他们又给军事小说注入了新的血液，作家们沿着革命现实主义道路，注重对当

代军人精神世界的纵深开掘，不仅写了英雄的壮烈牺牲，还敢于揭示他们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把英雄人物成长过程的曲折与整个社会政治风云、道德观念的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样，使得军事小说冲破了狭窄天地，能够从更广阔的世界再现八十年代当代军人风貌。

新时期短篇小说仅从创作题材扩展这一方面的成就来看，已经摆脱了僵化的窠臼，适应了新时代的历史要求，较之十七年有了飞跃的进步。

二、思想内容的进一步深化。现实主义要求作家按照生活的实际面目来描写生活，但是生活的实际面目并不只是表面的，它还有更深刻的内在含义，所以，现实主义作家应当不仅描写生活的表面真实，更应该写出生活内在本质的真实。过去，短篇小说在宣传党的政策、塑造模范人物形象、歌颂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诸方面，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社会教育效果是明显的。但是，由于一贯强调创作的社会整体意识，要求作家表现社会的“大我”，从而对作品反映人物个人命运和表现作家较强的主体意识的作品，则采取一种批判态度。这一来，不少作品虽然思想性很强，但却缺乏形象的感染力量，或者在作品里集体意识反映有余，而个性特点则表现不足。或者也可以说过去的一些作品，较多的是反映了生活的表面真实，缺乏对生活内在真实的挖掘。新时期以来，短篇小说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原则，向生活纵深推进。不少作家把握了文学是“人学”这一艺术规律，大胆地在“人”字上做文章，突出写人的命运遭际，把内容深化到人的本体意识并揭示其深广的社会意义，表现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过去多年被排斥在文学门外的敏感问题。过去曾有人把它视为“修正主义”的同义语，一提人道主义就把它与资产阶级人性论紧紧拴结在一起，似乎无产阶级与人道主义势不两立，拱手把人道主义奉送给资产阶级。这显然是一种对人道主义的曲解。

人道主义思想被新时期文学大胆接受有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近的过程。粉碎“四人帮”最初几年，文学的主题是着重从政治上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进行反思。刘心武的《班主任》从批判“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无用论”的独特角度，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这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呼唤。如果我们把这篇小说仅仅看成是表现人道主义的最初阶段的话，那么到了谌容的《人到中年》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反思作品，则把呼唤人性复归的这一最初阶段迅速推向统一人们的义务和权利，在更深层次上挖掘人的存在的真正价值的一个新阶段。这些作品向读者揭示了这样一种思考：人对社会不仅有应尽的义务，同时社会也应尊重和关注每个人的利益，让他们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一切。到了张洁发表《爱，是不能忘记》这一类作品之后，人道主义的思想又向更高层次发展，提出了人与人之间应当获得精神上的理解，从而把对人的关心和尊重推向每一个个体的内心世界。新时期短篇小说对于“人”的揭示，不仅升华到人道主义思想高度，而且比较彻底地打破了以往那种用善与恶，勇敢与懦弱，公德与自私等等简单的归类法给每个人贴上标签的模式。

总之，新时期短篇小说恢复了“文学是‘人学’”的本来面目，作品里的人物不再是干巴巴抽象的阶级共性的代表，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有个人独特命运的文学形象，这不能不说是革命现实主义发展的又一表现。

对国民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也是新时期短篇小说思想内容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方面。一九八四年全国首次掀起了所谓“寻根文学”的热潮，推出了一批“寻根小说”和“文化小说”，这是作家们在现实的土壤上向历史纵深开掘的尝试。近年来如贾平凹、韩少功、阿城、郑万隆等人，他们创作了为数可观的“寻根小说”和“文化小说”。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一方面批判了我们民族传统心理中的因循守旧、麻木不仁等劣根性，同时他们更为注意发掘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张扬中国人民在价值

念、道德准则，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受古代灿烂文化的熏陶。这批所谓的“寻根小说”和“文化小说”，虽然避开了现实描写，但它的现实意义却又不可忽视。八十年代是我们向着新潮流奔涌突进的大转变、大更替的年代，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文学能够审视历史，自省民族意识的弱点，发扬光大民族文化的精华，这对于促进民族意识的自觉，将会是大有助益的。

三、新时期小说创作流向出现了多样化势头。这个问题目前正引起众人的注意。流向既不是流派也不是倾向，而是从艺术个性方面表现的发展趋势。在粉碎“四人帮”的最初阶段，小说创作即使是些不成熟的较粗糙的作品，也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主要靠的是作品的真实性的力量。因为读者对过去那些虚伪的作品太厌倦了，现在出现了敢说真话的小说，自然感到格外新鲜，而不顾及其内容深度艺术水平如何了。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读者又不满足描述昔日岁月悲欢离合的故事，而要求作品有更更新的内涵、启迪和艺术感染力了。作家们适应这一要求，在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方面更自觉地发挥了艺术创作的想象力，产生了更具特色的作品。犹如同一原料，在不同厨师炒勺之下做出各不相同的佳肴，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在不同作家的具有艺术创作想象力的笔墨之下，在气氛创造、格调、意境、形式各方面却有着很显著的区别的佳作，这就是最近几年来小说创作的流向。流向是着重从艺术形式方面而言的，也可被看成是作家不同的个性、风格和手法。近年来小说创作流向趋于多样化，但它们都建筑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是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形式上的多面发展。

短篇小说创作的流向，可以分为四大类型：坚持贴近现实的写实派，及时反映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不大注意贴近现实，往往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力求表现地方特色的“乡土小说”；吸收西方某些现代派表现手法的“现代小说”；具有黄土高原和西北边塞地区风情的“西部文学”等。



“问题小说”着眼于写社会问题。一般说来，凡小说大致离不开社会问题，文艺作品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人是社会的，因而文学的社会性总是避免不了的。尤其是社会责任感较强的作家，他会随时关注社会现象，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这里所指的“问题小说”并不是指一般文艺作品的社会性，而是专指一些比较贴近现实，能以最迅速的创作追踪时代的脉搏，反映社会心态的作品。王蒙被人们誉为时代心灵的追踪者，他的《高原的风》比较他早些时候的《春之声》等，更注意通过新时期物质与精神生活变化的描写，发掘在新形势下人的心灵运动的轨迹。张洁的短篇，侧重于对社会道德观念的揭示，但《尾灯》对十一级干部邓元发旧意识的揭露与她过去的《谁生活得更美好》等短篇对旧意识的揭露相比，已经超越了一般社会道德范畴，而深深揭示出一些人灵魂深处封建主义的桎梏，并敏锐地指出这种思想毒瘤与社会改革水火不容的严重趋势。刘心武的纪实小说《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的发表，几乎与事件发生同步，及时反映了新时期某些人的社会心态，提出在当前的变革时期，人们需要相互理解才能保持心理平衡这一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张廷竹的《他在拂晓前死去》和徐怀中等人的军事题材小说，对于新时期我军战士的生活风貌作了别开生面的描写，从军人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体社会的某些观念的变化。

上述这些以反映社会问题为主旨的“问题小说”，与过去一些侧重写社会问题的作品明显的区别在于：没有过去常见的把人物作为抽象化分解问题的模式；没有揭示矛盾冲突后的总结式议论；没有概念化雷同化的公式。这些“问题小说”重视了对人的感情、性格、思想、道德、遭遇和命运的描绘，体现了“人学”的本质特征。

“乡土小说”在新时期小说创作园地里也是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刘绍棠是新时期唯一的正式打出“乡土文学”旗帜的作家。其余如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贾平凹、古华、铁凝以及